

【论 文】

近代康藏史研究的几点反思¹

——兼述康藏人眼中的辛亥革命

黄天华²

摘要：辛亥革命使中国从帝制转向共和，然而崇信佛教的康藏人却无法接受“被称为天子的皇帝”“被寻常路人人都可以当的总统代替了”，认为这是“西洋的邪见”，于是乎康藏人有些疏离民国中央政府。有意思的是，康藏人在反对政治洋化的同时，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洋文明其他方面的冲击和影响，他们就逐渐接受了民族平等观念，开始反对汉化，这一方面使得民国时期的汉藏纠纷不断增多，同时又促使中国固有的民族观念有了较大的改善。近代康藏史还揭示出，应该修正汉藏二元互动的观点，把“康”视为相对独立的一方，用汉、康、藏三方互动的观点来理解和把握近代的汉藏关系。

关键词：辛亥革命 洋化 汉化 民族平等 汉康藏三方互动

2011年，学术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多是从内地、汉人的立场和观点来论述的，很少关照到边疆地区人们的观点，这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今年又是第一次康藏纠纷爆发100周年，笔者就借此机会从新梳理相关史料，反思辛亥革命以来康藏历史的发展演化脉络，探讨其中几个此前关注不多的面相，并揭示康藏人眼中很不一样的辛亥革命。

一、从“天子”到“总统”：康藏人不可接受的洋化

1929年，松潘大寨土官但真王吉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黎光明等人说：

“大清皇帝出不出来还不晓得的呵！”

“大清皇帝真好。他每年要给我二十四两饷银；三年去朝贡一次，他还赏给我们很多东西。民国政府不给我们饷了，我们也不去朝贡了。”

“此刻，听说，没有皇帝，官也要拿来选。你选这个，我又去选那个；选来选去，两边打起架来；时而赶走了这个，时而又赶走那个；这个说那个不对，那个又说他自己好。成都‘三大宪’也就换过不少了！到松潘来的大官小官，一下说是这个放来的，一下又说是那个放过来的；有些同是一个放来的也会打起架来，我们弄不清这些那些，也不晓得怎样才好！”一言以蔽之：“还是大清皇帝出来要好些。”³

这段颇有意思的话透露出很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清朝体制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民国时期政局混乱之间的强烈反差。皇帝不管换了多少茬，但每年赏银和三年朝贡一次的规矩一直延续着。而民国时期不仅成都的“三大宪”如走马灯似地换，就是管辖松潘土司的大官小官也在不停地换，而且是用“打”和“赶”的方式换；就连同一个上司放来的官也经常打起来，

¹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11期，第9-15页。

² 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职博士后。

³ 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中研院史语所2004年版，第99页。原作者注称“从前谓总督将军和提督军门为三大宪，现在他们用为统呼成都高级官吏的名称”。又，王东杰《华夏边缘与“现代性”：一九二九年的西番调查》（《读书》2005年6期）和朱文惠《1912—1940年康藏纠纷的多方对话——以康巴观点为例》（《中国藏学》2011年第S1期）都引用了这一条史料，并从其他角度给予了解读，值得参考。



这使得土司们弄不清楚，“也不晓得怎样才好”。这无疑会使得土司们无形中就低看了很多，以致于觉得“还是大清皇帝出来要好些”。同时，朝贡至少从形式上维系了皇帝和土司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而民国时期土司们和中央政府之间联系就中断了，难怪他们并不很清楚国内政治状况，更很少有人知道新的政治首都是南京。有一位喇嘛就问黎光明：“宣统皇上这一会还好吗？”南京“是洋人的地方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民国时期的政统变了，从帝制转向共和，旧的体系打破之后，新的体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二是中央的式微，中央已不能有效管控地方，四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成都如此，偏远的松潘就更感受不到中央的福泽和威仪了。

无独有偶，1932年国民党中央所委任的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巴塘人）也在康区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凡在大道以外各县各乡村间之居民，根本上对于民国无所认识，三民主义更莫明其妙，所以许多村民，常询问当今皇帝是何人，或曰闻连年内地纷乱不堪，皆因真命天子未出所致，渠等所共知者，中国有唯一之皇帝，例系文殊菩萨化身，住于北京城，内地并有一佛地，名五台山，除此之外，对于南京也，上海也，以及国内一般领袖伟人也，均毫无所闻”。对此，格桑泽仁的感受是：“本来中国以五族共和，地大而交通不便，名为一国，实际上几等异域。”

[1] (P. 15-16)

曾于1943—1946年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的沈宗廉也回忆说：“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更迭，当初被称为天子的‘皇帝’，如今被寻常路人可以当的‘总统’代替了，这是大多数西藏人无法接受的。”^{[2] (P. 66)}以前的皇帝是天之子，或者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西藏人心甘情愿地信奉和服从；如今的总统寻常路人可以当，也就是说权力世俗化了。这种权力来源的变化、政统的转换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一时无法接受的。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奉旨前往山西五台山朝佛。这些史实说明藏传佛教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之间有相通之处，这或许正是历代中原王朝和西藏地方能够保持比较和谐关系的重要原因，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能在清朝统治西藏、蒙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因素。

1943年，从西藏求法回来的法尊法师说，当时西藏对于中央政府，可以说是持“一种远远观望的态度”，“他们也怀着一种内地能够统一的企望，他们现在有些人也知道内地统一之后，仍然归服中央比归服英人要好的多。第一就是一家观念，早就有的，用不着再去从新练习和构造。第二内地无论如何改变，终是一个信佛教的国家，绝不会闹到全无佛法 and 全无信佛的人。第三汉藏同是一种黄色的民族，语言方面也有许多互相借用，不像英语那样格格不入。第四蒙满民族的佛法，纯然是西藏的佛法，下至所诵的经文，都是整个的西藏字，并没有改动分毫。第五蒙满青甘诸省的佛教建筑以及文化等，多半是西藏的佛教建筑及文化。第六西藏三大寺的当权僧众和有大学问的僧众，蒙青等处的人很多，他们都有以内地为家乡的观念”。^{[3] (P. 359)}他又说：“西藏当局在前几年，他觉着我们中央是不会统一的，是没有实力能敌御外侮的，是没有力量能达到西藏的，是没有心思过问西藏的事的，是不能调解班禅回藏的事的，尤其是他觉着我们中华民族自从反正以来通同变成了西洋化，耶教徒，更没有一点佛法存在——西康的人这种见解尤甚，他们觉着皇帝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连皇帝都打倒不要，岂不是西洋的邪见吗。他们这种错误见解很深，他们总是固执不舍。”^{[3] (P. 113-114)}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西藏高僧喜饶嘉措也指出：一般边民固执旧习，“不能忘情于皇帝者，亦因满清尊崇佛法一端，非他故也”。^{[4] (P. 377)}在在都说明皇帝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同一般的。而且，西藏人认为不要皇帝是耶教徒的做法，是西洋化，这种“没有一点佛法存在”的做法是他们不能接受的。这一点从凤全和格桑泽仁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来。

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巴塘土司及喇嘛戮杀，史称“巴塘事变”，而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民众看来，凤全等人“习洋操，学洋话，行洋礼做作”，“冒犯神灵，污秽天地”，“此乃实为国内之祸患，扰害地方之贪官，故耳不揣有罪，一时错乱，已将汉官二员及洋人一并诛戮。此番原为国除害，实出无奈……”。^{[5] (P. 217-219)}

1932年，格桑泽仁回康办党。当时四川省都还没有正式成立国民党省党部。格桑泽仁到达康区后，“首先展开宣传工作，当时不仅藏族人民闻所未闻，惊奇注视，即驻康之川籍官兵，亦感觉新异，以怀疑之态度视之。当时康藏人民，一时互相讹传，认为巴安所设立之党部，乃一种外国洋教。盖自清季以来，藏人从未见政治仪式上有所谓俯首默念、（原文为逗号，打顿号要好点）唱党歌、读遗嘱之举动；他方面康藏人亦偶见外国传教士礼拜祷告时唱赞美诗之情形，与此类似，所以怀疑。以康藏人之普遍虔诚信仰佛教，倘党部被误会为与佛教相反之一称（种）（原文是称，应为种。这样标注下）洋教，则于工作前途影响殊重。本人乃多方奔走宣传，并向各大德高僧详细解释，印发大量藏文传单，强调两点：一、三民主义是政治不是宗教；二、三民主义符合释迦佛的救人救世精神，两者不相违背；并引申班禅大师在南京中央党部之演讲以证明之（当时本人为翻译），（原文的括号是在逗号后边，我觉得改成逗号前边好点）误会乃渐消除。惟一般喇嘛及头人等，前来参加党部开会，一见仪式，终觉不安而图回避。巴安包昂五呼图克图，素为康南人民所信仰，彼之脑筋比较灵活活泼，与我长谈多次之后，甚为明瞭，对党部十分赞助。彼向党部建议，‘欲康藏人不怀疑，进而踊跃参加党部，研究三民主义，宜在礼堂中总理遗像之旁，悬一释迦佛像’（此句原文有一引号）”。格桑泽仁依从他的意见，以为权宜之计，果然从此僧俗一致热烈参加。^{[6] (P. 4-5)}

格桑泽仁又说：“边疆地广人稀，一切均属落后，非内地人士所能想像。……在内地有些同胞认为你是狭隘自私的观念，顽固落伍的思想，而在边疆有些同胞，又认为你是洋化汉化的摩登人物，危险份子。”^{[6] (P.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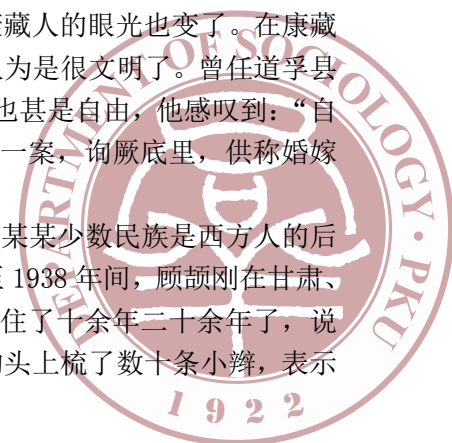
这里有两点甚是值得注意。一是很多藏人一度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与佛教相反的洋教”，所以反对、抵制；这提示我们在研究近代形形色色的“主义”时，要注意它和宗教之间的异同及其互动关系。二是一些西藏人这时觉得汉化和洋化有些类似，因为汉人已经洋化了，而洋化正是他们所反感的，所以他们也有些抵制汉化；这就提醒我们，在康藏史研究中，一定要对康藏人民的宗教观念和思想观念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二、追求民族平等：洋观念的冲击

康藏人虽然抵制和反对天主教、基督新教，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1929年前后，松潘等地的番人在成都看到“汽车”，就在心理上被慑服了。黎光明记载说：“西番在从前本来是很自大的，不知道汉人地方的情形，近来他们时常有人到成都，看见到处都是兵，又看见马路上的汽车跑得那样快，他们心理上便被慑服了，常说，‘汉人是不好惹的！’”^{[7] (P. 89)}飞机也是近代传入的西方新事物，康藏人就特别敬畏其威力，将之呼作“天菩萨”。1939年，川西北的绰斯甲土司反对西康省政府在当地开金矿，但又怕政府派人开飞机来金矿，无法应付。据载，绰斯甲“土人性畏飞机，称为‘天菩萨’，常戏叩以‘政府若派天菩萨来开办金厂，将奈何’，皆默不作答”。^{[8] (P. 65)}

同时，在西方冲击后，内地人的观念和眼光改变了，连带着看康藏人的眼光也变了。在康藏这块曾经被内地人视为蛮夷、落后的地方，如今在一些人眼中却被认为是很文明了。曾任道孚县知事的朱增鋈就发现康藏人的“天足”正是“文明”的表现，其婚姻也甚是自由，他感叹到：“自由结婚，西欧文明，不图潮流，远输边地。”他曾“讯夫妇各请离婚一案，询厥底里，供称婚嫁未久，例应各寻新交，予遵西例，笑而允之。”^{[9] (P. 112-16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来华西人特别是传教士经常在川藏地区宣扬某某少数民族是西方人的后裔，这就促使国人调整民族观念，以应对西方的文化侵略。1937年至1938年间，顾颉刚在甘肃、青海的藏族地区就发现：“许多黄发碧眼的人们在那边混着，他们已住了十余年二十余年了，说的番话纯熟得同番民一样，而且他们男的穿了没面羊皮的番装，女的头上梳了数十条小辫，表示



其道地的番化。到了番地里，挨家送礼，表示其亲善。听说他们又替番民照相，检出鼻子高些的，眼睛深些的，便说：“你本是和我们同种，只因流落到中国来，才比我们差些了。”1938年底，顾颉刚到云南后，“又听说这些侵略的先锋为了当地的夷民笃信诸葛孔明，又在捏造故事来装点自己，说耶稣是哥哥，孔明是弟弟，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了”。^{[10] (P. 104)}

1939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去西昌等宁属地区视察时，又发现“西人也有传教至夷巢里面去的，为夷人改善生活礼俗，并用英文字母将夷语译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视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问其祖国，甚有说是英伦者，有说是伦敦者”。这一事实给了刘文辉很大的刺激，于是制定了“一部脱历史窠臼、别开生面的《治理宁属边务方案》，开宗明义地规定：“宁属边民，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应受国家法律上之平等待遇。”^{[11] (P. 611-612)}

同时，民族平等这一近代传入的新观念也对中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宁属黑彝土司岭光电“曾受新式教育”，是中央军官学校第十期毕业生，在汉族人士看来，其“眼光远大，思想清晰”，“为边民中最有希望之人物”。^{[12] (P. 125-127)}然而，他自己却回忆说：“在外求学期间，亦因彝族地位低下而受尽歧视，处处显得低人一等。我时常被一种屈辱感折磨着，一种渴望自己民族站立起来的强烈感情时时冲撞着我的心灵。”他对俄国人顾彼得说：“虽然汉人把我们称作‘猓猓’，但我们十分憎恨这个称呼，因为它是蔑称，汉字里的偏旁带有‘犬’字，反犬旁的意思就是‘野兽’，我们也许是野蛮人，但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当着面这么称呼他。”^{[13] (P. 111、143、196)}

1931年，另一位彝族曲木藏尧（汉名汪济西）呈请国民政府将宁属划归即将成立的西康省并提高宁属夷族之地位，其言曰：“一、请明令承认夷为三危之后，与康藏同种；二、请明令夷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与汉人享受同等地位；三、请明令汉夷婚姻平等，过去夷人之女汉人可娶，汉人之女夷人则不能娶，此为汉夷不相合之一大原因；四、请沿中央待遇蒙藏青年求学办法，于京中设立夷人教化学校，教育夷族中能通汉文之青年；五、请于京中设立夷务办事处。”^[14]彝族人岭光电、曲木藏尧的切身体会就是自己经常受到汉人的歧视，以致有“一种渴望自己民族站立起来的强烈感情时时冲撞着”他们的心灵。他们希望中央将宁属划归西康，以得和藏族待遇平等，当然更要和汉人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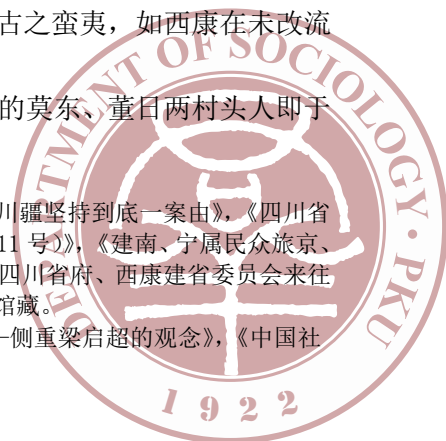
然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把宁属归“尚未开化之西康”是“弃明入暗”。因为宁属“开辟有二千余年之历史，文化水准与内地相同，而鸿通俊异之材，代不缺乏，与通都大邑人士，把臂入林，未遑多让，……倘使下乔木而入幽谷，使侪于尚未开化之西康，则用夷变夏，虽妇孺亦非所愿”。¹这说明近代中国存在着两种趋向，一方面是一些少数民族力图追求民族平等，另一方面则是延续几千年的“汉化”继续在进行。

晚清，在中西文野互易的局面下，²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仍然在川边地区大力推行“用夏变夷”的政策，施行儒家“教化”，这说明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来说，部分满清官员对华夏文明依然保持高度的自信。赵尔丰把兴学作为“收拾边地人心第一要务”，他认为需“先求文字语言相通，然后为其演说纲常名教之理”，才可能引导边地民众视“中土圣地为人生不易之归”，而不至于再为“歧途所惑”；“教以汉字，无非令其同文”，“于开通智识之中”，还隐含“混化种族之计”。^{[15] (P. 97)} 1911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焘甚至明言：“今之华夏大都古之蛮夷，如西康在未改流之先，蛮夷也，则康为川之边；既建省之后，华夏也。”^{[16] (P. 390)}

民初依然有部分藏族民众自愿归汉官管辖。以前属“藏番管辖”的莫东、董日两村头人即于

¹ 《为省务会议议决建南九属旅京同乡会代电陈划建入康不可理由、仰恳保存川疆坚持到底一案由》，《四川省政府民政厅签呈（1938年7月12日）》，《四川省政府批令（1938年民字第18711号）》，《建南、宁属民众旅京、省同乡会代表呈反对划宁属建南归康、川康两省互争卓斯甲布地段与内政部、四川省府、西康建省委员会来往行文》，全宗名称：四川省民政厅，全宗号：54，案卷号：7701，四川省档案馆藏。

² 详细的论述请参加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一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916年9月向同普县知事呈报愿意归附：“前赵大臣（即赵尔丰一引者）抵边，各属改流设治，而头人等地方偏居一隅，竟置化外。头人等屡欲输诚内附，虚愿莫偿。今值知事大人来同，仁风善政，遐迩咸钦，百姓等特具结前来委托头人代达，甘愿归同普管辖，完粮纳税，支应差使，伏乞俯纳，俾头人等两村人民得托庇宇下，有所依归，则感激无暨矣。”^{[8] (P. 20)}

1938年底到1939年春夏，顾颉刚在云南主持《益世报》边疆周刊，傅斯年特意提醒顾颉刚说，“‘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所以“边疆”这一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此事关系重要；而“此地之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故汉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若论种姓，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此种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进行中，即如主席龙云，猓猓也；大官如周钟狱，民家也；巨绅如李根源，夔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17] (P. 206-207)}随后，顾颉刚专门撰文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年之后，顾颉刚回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此文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得多了”。^{[18] (P. 373)}所有这些，都说明少数民族主动“华夏化”的现象在近代仍然在进行着。¹

西方观念的冲击使得近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发生很大的改变，一方面是汉藏纠纷不断增多，民国时期除了爆发三次大的康藏纠纷和两次“驱汉”事件之外，²在川边地区还有很多小的汉藏冲突，使得汉藏双方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局面。但另一方面，民族平等观念的传播与普及也促使中国固有的民族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有了较好的改善，这一点从对少数民族的称呼的改变上就可以看出来。前已述及彝人岭光电十分憎恨“猓猓”这个称呼。1940年，国民政府为“泯除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明令“禁止沿用苗、夷、蛮、猓、獯、獯等称谓”，要求对于边疆同胞，“应以地域分称为某地人”。^{[19] (P. 217)}史语所的芮逸夫等人便负责编撰“改正西南少数民族之命名表”，如将“猓猓”改为“木佬”，“猓猓”改为“保罗”，等等。

三、汉、康、藏三方互动的历史

格桑泽仁的经历还提示我们，要把“康”视为相对独立的一方，因为康是汉藏交接地带，与汉、藏都有同有异，要用汉、康、藏三方互动的观点来理解近代康藏史。1932年，格桑泽仁在巴安提出“康人治康”的主张，并因此采取了一些行动，成立了西康建省委员会和西康省人民自治委员会。支持格桑泽仁的康区土司头人包昂武、各苏、彭错、打吉、萨加登巴等人也向国民政府陈情：“康民受川藏夹压，无可伸诉……”。^{[8] (P. 456)}但是，格桑泽仁等人的行动不仅受到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的反对和武力打压，而且还引起了西藏方面的反感，藏军就和格桑泽仁领导的西康民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军事冲突；十三世达赖又向各贵族官员训话，说：“西藏今日之地位及汝等之处境，非常险恶。远看外蒙赤色恐怖情形，教王与一般贵族多被打倒残杀，近看西康一带也有人鼓吹一种危险思想，煽动所谓革命，竟驱使西康僧民疯狂的与藏军作对……”。^{[6] (P. 7)}1936年国民政府委派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以及1939年的班禅行辕又相继打出“康人治康”的旗号，同样获得部分当地土司、喇嘛的支持，虽然他们的行动最终都失败了，但至少说明康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想法和主张，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必须寻访、打捞和倾听这些淹没在汉藏大历史

¹ 关于少数民族之华夏化现象，请参阅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² 关于民国时期的三次康藏纠纷，论者很多，有关笔者的观点请参见“民初川边治理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3期；“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3期；“第三次康藏纠纷再研究”，《历史教学》2009年5期。



中的声音。这对正确、客观、深入地审视历史上的康藏问题都很有好处。

如众所知，在 1949 年以前的康区，汉化与藏化同时进行着，而何时汉化盛于藏化，何时藏化又盛于汉化，跟汉藏两方的势力盛衰有着极大的关系。汉方的势力强，康人更愿意认同于汉文化或标榜自己的汉化；藏人势力强，康人更愿意认同于藏文化或标榜自己的藏化。但无论如何，藏文化与汉文化互有融合，同时存在，不可能纯粹的或完全的倒向一边。

而且，在中原王朝统一强盛的时候，汉文化在康区的强弱主要跟中央政府的强弱相关；但到了民国时期，在中央政府式微的时候，康人汉化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就受到川康地方势力强弱的影响，受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中央地方一致、同心协力，康人就更能感受到汉官威仪。如果中央、地方之间陷入长期争斗，内耗不已，康人就会轻视汉官。民初，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即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中央政府一直要等到 1935 年才能介入、影响川省局势的发展，到 1939 年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和 1940 年蒋的心腹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的之后，中央政府才算比较能够掌控川省的局势。但川康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与蒋介石实际上处于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到了 1949 年 12 月，这三个人终发动彭县起义，背弃蒋介石，投向人民阵营。所以，历史的结论应该是“治藏必先安康，安康必先兴川”。

刘文辉就说：“四川安则康藏亦平静无事，四川乱则康藏问题亦随之而兴。”^[20]即使是诺那呼图克图这样提出过“康人治康”的地方精英，在 1930 年也认为：“我们西康人，不要听信谣言，对于四川妄想打主意分家，各干各的，那是现在的西康万万不能行的，只有我们西康人与四川人，大家联络起来，协力同心，来把西康的事情，好好的办理一下，这才是西康人要紧的事情，也是处于扶助地位的四川人，应尽的责任。如其遇着一派挟私心，说大话的人，我望你们不要听他，他们的办法，是使我们西康人，永远不能抬头的，……西康与四川，从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期，逐次的想来，都是彼此间很有重要关系的，假若我西康人民，要是去听坏话，与四川分开完全脱离了关系，那就没得第二个有实心实力愿来帮助的人，好好一个西康，定会送到帝国主义的手里，使我们子子孙孙，都受苛残压迫的痛苦了！我西康的人民呀！决不可听旁的骗人的话呀！”^[21]从民初川边地区主政者尹昌衡、殷承瓏、陈遐龄、刘成勋等人的上任、离任，到刘文辉经营西康时用心用力之程度及其变化过程，在在都可看出四川局势演变对川边的连带影响。

民初，由于历任镇守使的放任，“关外诸将士纵兵虐民，地方牧令，更猥杂无伦，市侩其行，恣意蹂躏，边民无所控诉。藏人遂得乘隙要结，嗾其背叛，历年溃兵军械，又大半为蛮人所得，益有所恃，故一经开衅，汉兵靡不失利，盖由主客之形既判，众寡之势又殊，遂至屡战屡蹶也”；而边民“实非有爱于藏方也”。^{[22] (P. 217)}刘禹九也指出边军的“放纵无度”使得川边民众滋生“叛意”，其言曰：“兵卒日寻蛮民而鱼肉，小有事故，辄诬为反叛，勒兵剿洗，盖利其财也。喇嘛寺尤为人人注目之所，察木多、咋雅、烟袋塘各寺，均为呼图克图坐禅地，辉煌庄严，即建筑工程，每处亦不下数十万金，其储藏尚不在内，均为彭、刘等军毁于一炬，大掠其所藏，而以剿叛报功，反得晋崇职、给勋章。蛮民由是痛恨边军，始真有叛意矣。”^{[23] (P. 172)}在 1917-1918 年的第二次康藏纠纷中，边军的失利使得“汉官汉军，在川边之声威，一落千丈”，政权乃益趋衰落。“康北人民前此之对于政治绝对崇信，从此虽不即有小视政府之心理，然而至少使人民发生怀疑政府之点，成为一种政权衰落的转变。……即康南以后造成不治之局，民七战役实为一大关键。康北仅有之甘孜、炉霍、道孚三县从此遂成为不生不死之局面。”^{[24] (P. 407-409)}可见川边主政者在当地的经营力度及其在康藏纠纷中的胜败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关系到川边的人心向背。

在历次康藏纠纷或重大事件中，康区土司的向背深刻影响着局势的发展。黄慕松就指出：“二十一年藏军之败北，孔撤土司力莫大焉。”^{[25] (P. 12)}有人又说：“（德格）土司庞大，辖有数千人，复活以来，仍握有邓、德、白、石、同五县之实权。而又介于康藏之间，事齐事楚，均有可能。即现隶政府之下，对藏仍不忘回顾，频送秋波，盖不欲开罪于任何一方也。模棱两倚之态度，为其十年来生存策略。”地方当局也不得不极力笼络和羁縻这些土司，据记载：“德格土司在康区的

势力很大，国民党历来重视笼络利用他，不时加官晋爵，送枪送马。”^{[26] (P. 166)}德格土司之下最大的头人夏克刀登，因“家宅、田产、农奴、百姓皆在河西，尤有不能不与藏官周旋之处。表面虽云对汉方效忠，内情莫可得而测也”。夏克刀登又曾先后归附诺那和红军，且“红军退康时，青军驻防邓、德、白、石四县，彼复导藏军渡江，逐走青军，占领四县，恢复民七以来原状。盖彼家在河西，固以土境全隶藏方为利也。后因班辕返藏之威胁，藏军退回金沙江西。夏克复输诚刘文辉氏，获其信任”。^[27]由此可见，土司、头人的向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本原则就是归附于最有实力且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方。

1939年元旦，刘文辉在论说西康正式建省的意义时又说：“从来论西康者，不曰为四川徼外之地，即曰吐蕃附属之区，有其地而无其名，更无所谓史也。从今以往，经制完成，封疆明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将渐与内地各行省等量齐观，此其划时代之历史意义。”^{[8] (P. 73)}凡此种种，都说明康区有其相对独立性，应该在汉、康、藏三方互动的立体图景中来把握近代康藏史。

结语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时也可能是无所适从”。^[28]在打倒皇帝之后，民初中国尝试了共和制，随后国民党又建立了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但以前在清朝皇帝治下的一些族群却并不认同这两种新的政治体制，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洋化，内中一些激进分子甚至有了离心倾向；另外一部分则受西方新观念的影响，努力追求民族平等，反对汉化。总之，以前被广泛认可的汉文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少数民族不再认为汉族和汉文化是最高、最好的，他们有了新的参照系，于是乎近代中国出现很多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同步、不协调的现象，产生很多和以前大不一样的纠纷与冲突。外国势力且乘机而入，夺取很多中国的主权和权益，造成很多影响重大的边疆危机，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1937年，时人就说：“一国之安危，恒系其边防之虚实，……十年来，边疆各部，时有畦畔之争，虽为局部纠纷，往往足以影响大局。”^{[4] (265-266)}诚哉斯言！检视近代中国的蒙藏问题、新疆问题、东北问题，无一不是如此。

在这样一种新旧过渡的时代，各种势力都在竞争、角逐，都希望取得领导性或压倒性的地位，或者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在各种大的势力或群体之间，还有很多小的势力或群体，他们也有自己的主张和选择，甚至有意利用其倚重倚轻的中间位置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可以从近代汉、康、藏三方互动历史中得到证明。1945年，格桑泽仁指出：“赵（尔丰）氏之建省经营半途而废，遂致西康陷于政治上青黄不接之恶境。盖旧制度已遭破坏，新制度未能建立，实为三十年以来康区混乱不安之主要原因。”“东藏（即康区一引者）各地之最大问题亦即东藏人民最大之痛苦，乃在新旧制度并存，人民夹在汉官与土头双重管制负担之下，不胜其重压之苦。复因县府与土头互相推诿牵制，亦因任何一方面之权力不够完整充实，以致各地治安问题丛生。今后欲求东藏政治之安定，人民痛苦之解除，要在于如何谋取新旧制度之合流，使县府土头势力合为一体。并宜任用当地人为县长。……至东藏各地省县政府所办之教育及文化经济事业，亦多不能因地制宜，而按藏族人民之需要与习惯以求适合，仅一味以内地方式办法强行移植。”^{[6] (P. 101-102)}这充分说明建立一种能够合理地照顾各个势力或群体的利益，并获得他们共同拥护的新制度，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不断探索和适时调整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贯穿于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

参考文献：

[1] 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无出版项。



- [2]沈宗濂、柳陞祺,《西藏与西藏人》,柳晓青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 [3]法尊法师,《现代西藏》,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十八册)[Z].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 [4]《民国藏事档案编年(1935—1939)》.张羽新、张双志编纂,《国藏事史料汇编》(第六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 [5]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编,《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第一编),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
- [6]格桑泽仁,《边人刍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7]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2004.
- [8]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 [9]朱增望,“川边政屑”,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成都:巴蜀书社,2006.
- [10]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1]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成都:巴蜀书社,2006.
- [12]朱契,《康昌考察记》,梁公卿总主编,《西南民俗文献(十二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 [13](俄)顾彼得,《彝人首领》,和镑宇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
- [14]“罗罗民族之要求”,《新亚细亚》第二卷第五期.
- [15]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 [16]傅嵩焘,《西康建省记》,梁公卿总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第十九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 [17]傅斯年,“致顾颉刚”,“致朱家骅、杭立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 [18]顾颉刚,“顾颉刚自传”,《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20]正鍈,“川谣与康藏”,《康藏前锋》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 [21]诺那呼图克图口述,罗松涛记录,胡吉农校订,“诺那告诉西康民众的几句话”,《新西康》特刊号.
- [22]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 [23]刘禹九,“拟设筹边处经营边藏策略”,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 [24]佚名,“治理康区意见书”,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成都:巴蜀书社,2006.
- [25]“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 [26]文阶,“德格写真”,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 [27]任乃强,“西藏自治与康藏划界”,《边政公论》第五卷第二期.
- [28]王汎森,“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时代的傅斯年”,《读书》2012(2).

